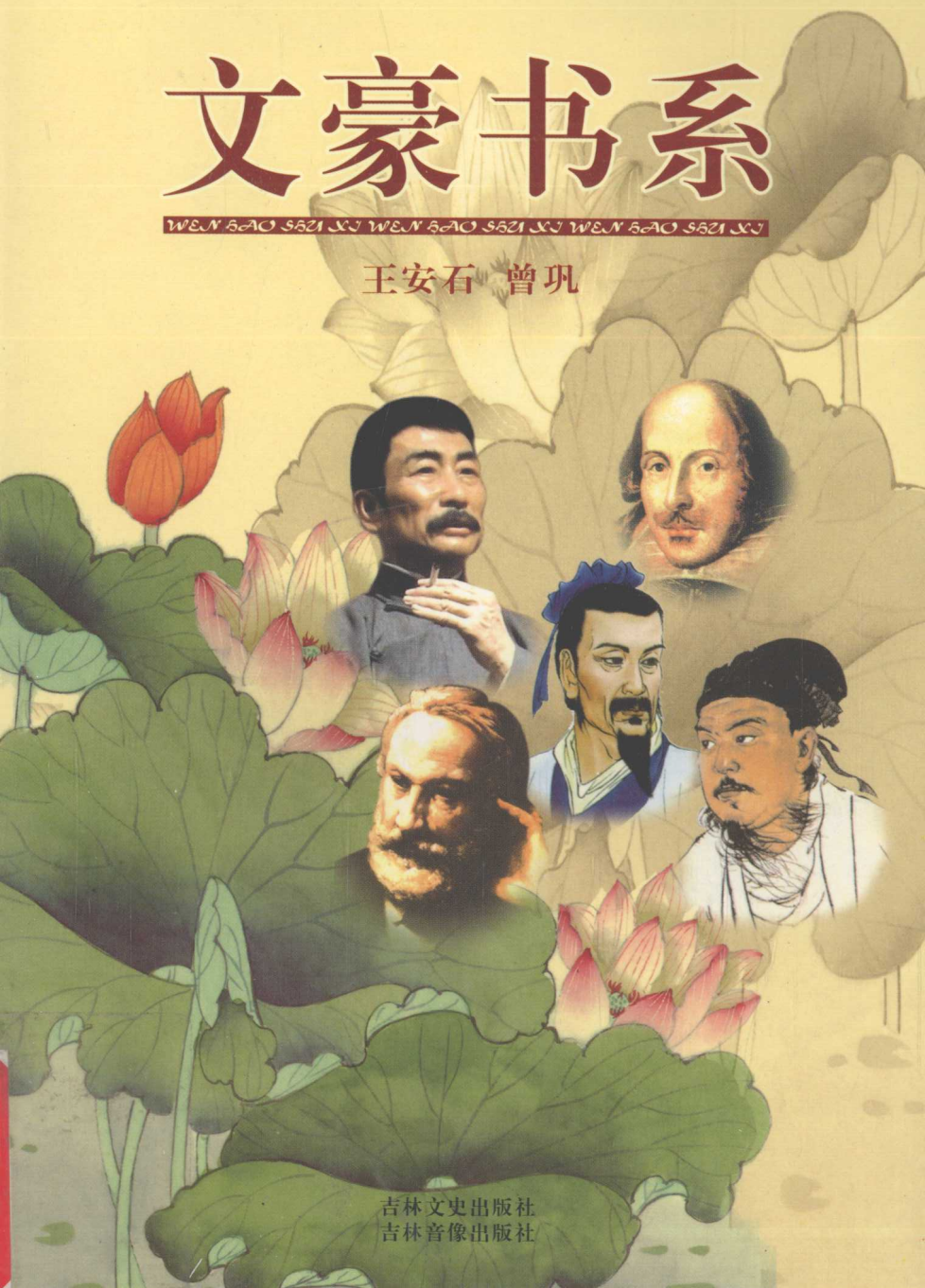


文豪书系

WEN SAO SHI XI WEN SAO SHI XI WEN SAO SHI XI

王安石 曾巩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Wen Hao Shu Xi
文豪书系

王安石 曾巩

第 14 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豪书系/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247-7

I.文... II.丁... III.文豪—丛书 IV.I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3 号

文豪书系

丁华民 孟玉婷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80.5

字数:3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47-7/I·37

定价:936.00元(全36卷)

目 录

王安石	(1)
材 论	(5)
对 疑	(8)
委 任	(12)
风 俗	(15)
读《孟尝君传》	(18)
同学一首别子固	(19)
游褒禅山记	(21)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23)
谏官论	(25)
伯 夷	(29)
答韩求仁书	(31)
上运使孙司谏书	(40)
慈溪县学记	(44)
祭范颍州文仲淹	(47)
子 贡	(50)
大人论	(53)
老 子	(55)
荀 卿	(57)
复仇解	(59)
卜 说	(62)
相鹤经	(63)
伤仲永	(65)
答司马谏议书	(66)
答曾子固书	(68)

君子斋记	(70)
桂州新城记	(72)
太平州新学记	(74)
李通叔哀辞并序	(76)
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	(79)
桂枝香	(85)
千秋岁引	(88)
曾 巩	(91)
寄欧阳舍人书	(91)
赠黎安二生序	(95)
太祖皇帝总序	(97)
《战国策》目录序	(105)
《李白诗集》后序	(109)
序越州鉴湖图	(112)
送蔡元振序	(121)
与王介甫第一书	(123)
答王深甫论扬雄书	(125)
宜黄县县学记	(130)
墨池记	(135)
学舍记	(137)
南轩记	(139)
鹅湖院佛殿记	(142)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143)
熙宁转对疏	(147)
敕监司考核州县治迹诏	(156)
议经费	(158)
苏明允哀辞	(161)
夫人周氏墓志铭	(165)
洪渥传	(167)

王安石

宋代政治家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其父王益，行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少年时喜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他文思敏捷，落笔如飞，初看好像漫不经心，完成后竟是一篇精彩奇妙、令人赞叹的好文章。他的诗词清新高峻，散文雄健峭拔，政论简洁有力，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朋友曾巩把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他播扬美誉。后来，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上等，任签书淮南判官。到职后的王安石还是勤奋好学，通宵不寐，常常稍作假寐，来不及梳洗就去官府上班。三年的任期满了，他又来到京师听候新的任命。正当王安石高中进士和任签判期间，范仲淹提任副相。在宋仁宗的动员下，上了“陈十事疏”，发动庆历新政，锐意改革，刷新吏治，但新政很快失败了。此次王安石重临皇城，看到了依然是弊政处处，不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政通人和，百废待兴的样子。王安石对时政异常发愁，他不想按一般官场惯例在京谋求翰林院等接近中枢、易受赏识的官职，以求得到较快升迁的机会，而立志到地方上去考察时弊，寻求改革之道，以充实他的治国良策。于是，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他又离开京师，风尘仆仆，来到东海之滨的鄞县（今浙江宁波）充当知县去了。

在鄞县为官期间，他看到这块滨海地方，虽然环境很好，但百姓贫困潦倒，一种父母官的责任心驱使他无暇休息，立即组织人对农田水利建设受破坏的情况进行考察，对官员豪绅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状况进行调查，并向上级官员条陈了东南百姓饥馑的状况。他要从改变县吏脱离民生实际的弊病做起，在摸清基本情况后立

即兴利除弊。他动员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投入水利工程修治,川渠河港的疏导,堤坝坡堰的兴筑,蓄水泄洪的兼顾,以谋求旱涝两利,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考虑到当地渔农春汛出海捕鱼而青黄不接的困难,王安石决定以常平储粮,低息贷与渔荒的困难。他把官谷贷给百姓,秋后百姓加些利息偿还,使官谷中的存谷能够陈谷换新粮,百姓也感到方便。在劝课农桑的同时,王安石还兴办学校,劝民入。三年治鄞的结果,取得了修复农田水利,缓解灾情,发展生产,百姓生活有所提高的业绩。这是王安石跨出社会改革的初步尝试。

皇祐三年(公元 1051),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中部)通判。是年四月,两朝元老宰相文彦博向朝廷举荐王安石,说他淡泊名利,请求越级提拔,企图以此来遏制为名利而奔走的竞争风气。但王安石以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重难住京师四条理由而拒绝。欧阳修推荐他任谏官,他也辞谢了。在王安石看来,时机尚未成熟,宁愿在下面继续摸索改革之道,是他一再推辞晋升的重要原因。

王安石生活的时代是北宋中期,当时国家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由于连年战争造成的巨大军费和行政开支,使朝廷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二是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随之而带来的阶级矛盾的激化。为了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风俗,王安石曾满怀激愤地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难穷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落败坏,症结在于不知道规律,不效法先王政令。效法先王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我们所进行的更改变革,既不至于惊扰天下人的视听,也不至引起天下人的喧哗,也就必然合乎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代以来的太平治世,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忧患。忧患在于治理财政没有符合它的规

律。居官任职的人才毁然不足，城乡又缺乏可以使用的人才，国家的重托，疆域的保持，陛下能够长久依靠天赐的幸运为常法，而没有一旦发生忧患的考虑吗？我希望陛下能明察朝中苟且因循的弊病，以期符合当前世事的变化。我所说的，流于颓靡风俗的人是不会讲的，而议论国家大事的人又认为这是不近事理的陈词滥调。”为了改变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王安石曾提出了治理国家经济秩序的整套方案。概括起来：一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关键在于“善于理财”。他认为，一切弊端并非产生于财富的不足，而产生于“治财无其道”。如果理财有方，就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二是发展农业生产是解除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本途径。宋朝所以形成积贫积弱的国势，根源不在于“支”大于“收”，而是生产太少。如果只知“节流”，不知“开源”，就好比关起门来与自己的儿子做生意一样，虽尽得儿子之财，但“犹不富也”。因此，所谓“理财之道”，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从自然界中索取更多的财富为核心的。三是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兼并。这种措施不是以传统的政治手段进行直接抑制而是通过财政征课或其它经济方式间接地予以抑制。

王安石的见解，深得宋神宗的赏识和赞许。一次，神宗皇帝召见王安石问他治国方略，王安石回答说：“首先要选择推行政策的方法。”神宗问道：“唐太宗怎么样？”他答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要效法唐太宗呢？尧、舜之道，极其简明而不烦杂，扼要而不迂阔，容易而不繁难。但是后世学者不能通晓，才以为高不可及。”神宗说：“你这可说是以难为之事要求我了，我自顾微末之身，恐怕无法与你的这番好意相称。你尽可以尽心尽意地辅佐我，希望共同成就这一目标。”

熙宁二年（公元 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开始了他的改革大业。首先他新建了一个财政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接着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问世。实施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兴修水利和

开垦荒地,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颁布青苗法,在农村青黄不接时按农户的贫富程度对农民进行低利贷放;实行均输法,改无偿运送上贡物资为有偿运送,以减轻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运送贡品的烦难;实施保甲法,把乡村人口编入户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弩,教他们战斗阵法;推行免役法,过去承担各种差役的民户不再服役,而按户等高下负担雇佣役夫的费用,并对一向不负担徭役的官僚大地主征收助役钱;实行市易法,在京师设常平市易司,经营收购商品和赊购商品业务,以打击商人资本的投机活动;实行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用牧马兼现有的马匹给他们喂养,或是官府给买马的钱,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程度,死亡或生病的要补偿;推行方田均税法,依据土地肥瘠程度分土地为五等,进行大单位面积的土地丈量,以平均土地税的负担。王安石变法在改善北宋中央财政状况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变法在减轻农民负担,抑制豪强兼并方面却收效甚微。

王安石的议论高深新奇,善于用辩论驳难,用旁征博引来维护自己的学说。为了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他全然不顾在朝百官的反对意见,辩论起来动辄数百言,众人不能使他屈服。他甚至说:“天变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顾忌。”为了扫除变法道路上的障碍,他不惜把反对他变法的朝廷内外老人几乎罢黜殆尽。由于旧党的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迭遭责难,遇到许多阻力,直至熙宁七年被罢相,第二年复相,九年再罢相,最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几乎全被排斥。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当王安石听到自己为上户谋、为富国谋的免役法也被罢去的消息时,忧思如涌。同年四月,这位叱咤风云的改革家与世长辞了。

材 论

文论述了人材对天下治乱安危的极端重要性，提出统治者对人材的访求和任用是否持积极态度，能否为人材的产生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人材能否涌现的关键。

本文中着重论述选材之道，先以骅骝作比，谏喻统治者对人材应“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又以南越之簞用之不得其方，则效用大异来说明统治者对人材应“铨量其能而审处之”。借以阐明正确的选材之道，并抒发其在位者未及深思而妄言“天下果无材”之哀。提出只有对人材采取正确的态度才会促使贤材辈出的观点。

【原文】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富贵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惛惛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骅骝杂处，饮

水食刍，嘶鸣蹄啮，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弩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骀衰与弩骀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箛，簇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鹔之劲翮，加强弩之上而弘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觊武之所宝也，然用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挺。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铨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犖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后，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划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译文】

管理天下的忧患，不在于担心人材不多，而是担心在上位的人不想使人材众多；不担心士人不想有所作为，而是担心在上位的人不想他有所作为，可以任用的人材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得到人材国家就会安宁繁荣，失去人材国家就会覆灭受辱。身居上位的人却不想使人材众多、不让他有所作为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

为有三种偏见。其中最大的偏见，是认为自己的地位可以消除侮辱断绝危害，一生都不存在危害国家的事情，人材的得失，对于兴盛衰败的命数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就心安理得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导致败亡危难，这是一种偏见。还有人以为我的爵位俸禄富贵，足以吸引天下的士人，荣辱喜忧都决定于我，我可以坐在这里傲视天下士人，没有人不奉承我，但最终也走到了败亡危难受辱的地步，这又是一种偏见。又有人不去寻求培养挑选任用人材的办法，只是满怀忧虑地认为天下没有有才能的人，那么最终也会导致败亡危难受辱的局面，这又是一种偏见。以上三种偏见，他们产生的祸患一样，只有用心并不是不好尚且能够评论一下他的失误的，是那种认为天下没有人材的。他的内心并非不想任用天下的人材，只是不明白罢了。况且有才能的人，在外形上和其他人有什么分别呢？只是他们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办好，筹划对策可以切中利害关系，治理国家就会安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身居上位的人如果不能仔细观察、审慎任用，即使他们有皋、夔、稷、契那样的智慧，也不能和众人区别开来，更不用说是职位低的人了。世上有偏见的人会说：“身怀奇异才能的人，好比锥子放在了皮囊之中，他的锋芒马上就能表现出来，因此向从来没有本事而不能显露的事。”这些人只看到了锥子放在皮囊里，却没看到马厩里的马匹。劣马和良马混杂在一起，喝水吃草，鸣叫踏咬，要找出他们的不同之处太困难了。等到用它们拉车，走在平坦的路上，良马不用多次挥鞭，也不用驾驭，一抖缰绳就可奔驰千里。与此同时，让劣马和良马并驾齐驱，即使把车轮弄倒了、缰绳拉断了，伤筋动骨、昼夜不止地奔跑，也远远赶不上良马。这样以后才能辨别出骐驎骀骀和驽骀的分别。古代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材，用尽所有的办法去发掘人材并加以测试，测试的方法，在于和他本身的能力一致而已。南越的长箭，箭头用的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铁，括羽用的是秋鹇的硬翮，搭在质量好的

弓箭上就能够射到千步以外,即使对方用犀牛皮的铠甲保护,也无不立刻穿透而死,这种天下出奇的锋利武器,是制胜取得成功的宝物,但用来敲打东西,就和枯槁腐朽的木棍没有区别。由此可以知道即使得到了杰出的人材,有杰出的智慧,不按正确的方法使用,也像这样一样。古代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可以估量他的才能而谨慎地为他安排个职位,使每个人的大小、长短、强弱全都适合各自的工作。像这样即使是蠢笨鄙陋的士人,也都能够竭尽全力做好一些小事,更何况那些有着卓越突出智慧的人呢?唉!后代的官员,并没有寻求过这种学说并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反而凭空说世间的确没有人材,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有人说:“古代有一整套培养造就人材的办法,你却只谈到了搜求和任用人材,这是为什么呢?”我的意见是:“天下的法制没有确立之前,一定要先搜求天下的人材加以任用。如果能寻求到天下的人材,就能恢复先王的法度,能恢复先王的法度,那么天下的小事就都像先王的时代一样了,何况像教育造就人材这样的大事呢?因此我才只说搜求和任用人材的方法。噫!现在的天下曾经担心没有人材。我听说,东方六国采用合纵的谋略,而游说智辩的人材就出现了;刘邦和项羽并存于当世,而策划战斗的人就出现了;唐太宗想治理好天下,而出谋划策勇于进谏的副手就出现了。这几种人,在这几位帝王出现前不存在,如果国君想得到他们,他们自然会出现。天下这样广大,人物这样众多,却说果真没有人材可以使用,我是不相信。

对 疑

本文阐释了对当时朝廷下发的一道敕书所涉内容的疑问。指出,以孝治天下并非只做表面文章,而在于采取一些切实可行又符合实际的措施。否则,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会引起公卿大夫的困窘。文章用较大篇幅分析了这项在当时情况下难以执行的

政策，它并非是学习先王用权变的方法来处理事务，而是违背先王安慰、抚恤士大夫之原意，从而为此项政策的不合理性找到理论根据。

文末以疑问作结，绵里藏针。笔墨之外，此敕书内容之荒谬尽显无遗。

【原文】

己亥敕书：“自今内殿崇班以上，大丧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则勿致，如其故。”于是有疑者，以为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独遇之如此，顾而问曰：“今子以谓如何？”尝窃原朝廷之意以对曰：先王之制丧礼，不饮酒，不食肉，不御于内，以致其哀威者，所谓礼之实，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论其人之贵贱，不视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则虽贱者亦使之饮酒而食肉，此所谓以权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后事行，或身执事而后行者，所谓礼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论其人之贵贱，视其世之可否，而为之节者也。视其世之可否而为之节，故金革之事，则虽贵者亦有时乎而无辟，此所谓以权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大丧则皆无以身执事，而从古者卿士大夫之礼，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于此者。古之时，卿大夫之丧，所以听身不执事者，为其可以不身执事也。其可以不身执事者，何也？古之人君于其卿士大夫之丧，所以存问养恤者，盖不诎于其在事之时，其有大丧而得不以身执事者，以其臣属足使而禄赐足以事养故也。今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其素所以富养之，非备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丧者，则朝廷视遇与庶人之在野者无以异。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养其妻子，有常产矣。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去位而治丧者，则其使令非有臣属，事养非有禄赐，一日无常产，则其穷乃有欲比于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为之忧此，而曰“汝必无以身执事”，则亦有饿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议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丧者众矣，吾未见有饿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

丧者，自非多积馀藏，有以活身，则孰能无以身执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丧者，故欲使其致丧之实而无以身执事也。苟不能使之无以身执事，而徒使之去位，则岂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于此者，谓所以存问恤养士大夫如古之时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财，而存问恤养士大夫如古之时，此吾之所易为也。仰无以葬祭其先人，俯无以畜养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丧，无以身执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礼，此人所难行也。舍吾之所易为而忽不谋，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为也。”操人之所难行而诛之不释，曰：“古之士大夫皆然，尔奚事而不为？”朝廷或者以为此非先王以权制丧、内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为。虽然，愚亦有疑焉，欲内恕以及人而不为吾之所易为者，何也？

【译文】

己亥这一天皇上颁布诏书说：“从今往后内殿崇班以上的官员，遇到家中大丧可以退职回家，供奉官以下的不允许，一如既往。”于是有人发出疑问，认为供奉官以下也属于士大夫，朝廷却这样对待他们，就问我：“你认为怎么样？”我曾经推究朝廷的意思回答他们说：先王在服丧礼时，不喝酒，不吃肉，不在内宫居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难过，这就是所说的实实在在的礼节，是否实施全在于自身。不管人的地位的高低，也不看时代是否允许，执行礼节都是相同的。然而有病的人即使身份低微也要让他喝酒吃肉，这就是所谓的用权变的方法施行礼节。有的人不需要讲话却可以做成事情，有的人说完话再把事做成，有的人自己亲自去做之后把事做成，这就是所谓礼节是外在的，要看对什么事物施行。评论人地位的高低，看时代是否允许执行，对礼节加以节制。看时代是否允许对礼节进行约束，所以涉及战争的事情，有时连地位高贵的人也不能回避，这是所说的用权变的方法节制。现在想让三班大臣充当供人驱使的差吏，遇到大丧都不要执行事务，按照古代公卿大夫

的礼仪去做，这本来就是太平盛世应该重视的，也是先王用孝治理天下的本意。可是有的事情又比这些要紧。古时候，公卿大夫遇到丧事，可以听凭他们不用办理事务，是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处理事务。为什么能够不用处理事务呢？古代君主在公卿大夫遇到丧事时，给予他们的安慰补贴的恩惠，并不少于为官时，遇到大丧可以不用亲身处理事务，是因为大臣们的部下足以办理好事物，俸禄全额发放足以侍奉的缘故。如今朝内大臣充当了奔走驱使的差吏，日常给他们的待遇又不丰厚。一旦让他们辞去职位回家治丧，朝廷的待遇就和平常百姓没什么分别。平民百姓，可以殡葬祭祀祖先，抚养妻子儿女，是因为他们有确定的产业。供皇上奔走驱使的朝廷官员，辞去职位去治丧，手下没有服役人员，没有俸禄供养家人，一天没有固定的收入，就会走投无路即使想和平民百姓相提并论也无法办到。如果执政者不知道为此担忧，却说“你再也不要亲自办理任务了”，那么也会出现因饥饿而死的士大夫。可是世上一些议论者会说：“现在，小官吏辞去职位治丧的很多，我也没有见过有饿死的。”现在辞职治丧的人，如果不是有多余的储藏，能够养活自身，谁又能不亲自处理政务呢？现在让他们辞职治丧，就是让他们真的去办理丧事而不再处理政务，如果不让他们处理政务，只是让他们辞职，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要务，是先王用孝治理天下的原意？所以我说有的事务比这件事急迫，我认为像古代那样慰问抚恤士大夫，才是今天首先要做的事。使国家政治清明从而使天下财利充足，像古时候那样安慰抚恤士大夫，对我们来说就容易做了。如果士大夫对上不能殡葬祭祀祖先，对下不能养活妻子儿女，尚且辞职去办理丧事，不再在朝廷任职，可是仍想按照古代士大夫的礼仪，这是人们不能做到的。放弃我们容易做的而疏忽不加谋划，说：“这些都是先王的事情，并非我们现在所能做的。”用别人难以完成的事情做借口而不停地指责，说：“古代的士大夫都这样，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朝廷中有人认为这并非先王用权变的方法办理

丧事、内心饶恕自己和别人的办法，所以停止不做。即使这样，我心里也有疑问，想在内心宽恕自己和别人却又不做那些不难做的事，这是什么原因呢？

委 任

荆公为文，多深思远识，本文亦如此。

针对当时官吏选拔标准有失偏颇之现实，荆公以其治天下之自觉奋笔疾言，指陈时弊，畅快淋漓。文中援古证今，辞意切直，笔力更觉遒劲。

通篇大意在于谏诤当政者法古代贤王委任官吏之道：但求其用，不求其全；信其忠而不疑其伪。并着重指出，为君者对待臣属应推心置腹，做到“任之重而责之重”，则君臣和协、上下同心。文以“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顾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作结，则政事之阙失，事理之曲直毕现。读之令人神动。

【原文】

人主以委任为难，人臣以塞责为重。任之重而责之重，可也；任之轻而责之重，不可也。愚无他识，请以汉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则任，可以止则止。至于一人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情有忠伪，信其忠则不疑其伪。其意曰：“我以其人长于某事而任之，在它事虽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于我心而任之，在它人虽伪何害焉？”故萧何刀笔之吏也，委之关中，无复西顾之忧；陈平亡命之虏也，出捐四万馀金，不问出入；韩信轻猾之徒也，与之百万之众而不疑。是三子者，岂素著忠名哉？盖高祖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则它人不能离间，而事以济矣。后世循高祖则鲜有败事，不循则失。故孝文虽爱邓通，犹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终定天下大策。当是时，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后则不然，虽有何武、王嘉、师丹之贤，而胁于外戚竖宦之宠，牵于帷墙近